

新旧中西之间

——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

张
越
●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新旧中西之间

——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

张
越◎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张越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013-3425-4

I. 新… II. 张… III. 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2453 号

书名 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

著者 张 越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978-7-5013-3425-4/K·1481

定价 28.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所论之五四时期史学，在时间上大体是指从《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到1927年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新、旧史学的冲突与承继，中、西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气象，带来了中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

责任编辑 张爱芳
封面设计 李 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相关书目

- | | |
|--------------------------------|--------------|
| 刘俐娜 著 | |
|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2.00 元 |
| 陈其泰 著 | |
| 《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6.00 元 |
| 王学典 著 | |
|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4.00 元 |
| 谢保成 著 | |
| 《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2.00 元 |
| 陈鹏鸣 著 | |
| 《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0.00 元 |
| 牛润珍 著 | |
|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 | 定价：22.00 元 |
| 浙江图书馆 编 | |
| 《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 定价：75.00 元 |
| 国立北平图书馆 编 | |
| 《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影印) | 定价：96.00 元 |
| 王韬等 编 | |
| 《近代译书目》(影印) | 定价：105.00 元 |
| 本社 编 | |
|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藏荟萃》(全二十册)
(影印) | 定价：8500.00 元 |
|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藏荟萃续编》(全二十册)
(影印) | 定价：8500.00 元 |
|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藏荟萃三编》(全二十二册)
(影印) | 定价：9300.00 元 |

目 录

绪 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历史学·····	1
一	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强之路与史学近代化·····	1
二	新旧中西之间:中国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11
第一章	“新史学”:中国史学转型的宣言·····	18
一	“新史学”的理论特点与创新意义·····	19
	(一)《中国史叙论》的理论创新·····	19
	(二)《新史学》的“破坏”与“建设”·····	24
二	“新史学”思潮的批判意识·····	32
	(一)“新史学”批判旧史学·····	32
	(二)“新史学”思潮的继续发展·····	40
三	20 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及其学术建树·····	44
	(一)异中有同:20 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普遍性意义 ·····	44
	(二)20 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学术建树·····	49
第二章	“整理国故”运动与五四时期史学·····	60
一	“整理国故”运动对史学的影响·····	60
	(一)“整理国故”运动对历史学科建立的促进·····	60
	(二)“整理国故”与“科学方法”·····	65

二	国学必读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74
	(一)胡适、梁启超“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不同	74
	(二)对“文化史”的不同理解	81
第三章	史料观念的变化与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89
一	新史料的发现与史料观念的变化	89
	(一)发现与接受新史料	89
	(二)建立新的史料观	102
二	走出经学羁绊的五四时期史学	114
	(一)近代以来经史地位的变化	114
	(二)史学独立与经史关系	126
第四章	借鉴西方史学与继承传统史学	133
一	引进西方史学与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	133
	(一)引进西方史学的热潮	133
	(二)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和经验	139
二	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初步总结	148
	(一)重视阐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148
	(二)对传统史学理论的认识和评价	155
第五章	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特点	167
一	五四前后历史考证学之兴起	167
	(一)对传统历史考证学的承继	167
	(二)史学的“独立”、“求真”和“科学方法”	172
二	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179
	(一)王国维、陈垣、胡适对历史考证学的贡献	179

(二)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特点分析	187
第六章 五四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变性与多样化	197
一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与“新史学”思潮的走向	197
二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213
三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235
四 何炳松的史学思想	248
五 东西文化论战与史学	256
第七章 打破旧的古史系统与“古史辨派”	268
一 五四时期疑古思想的形成与高涨	268
(一)顾颉刚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68
(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	276
(三)对古史论战的评述	281
二 顾颉刚疑古思想分析	295
(一)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特点	295
(二)“古史辨”、“疑古派”“古史辨派”诸说辨析	307
第八章 五四时期的史学方法	326
一 对“科学”的史学方法的重视	326
二 多样化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对史学方法的总结	333
第九章 现代史学规模的初建	341
一 新的历史教学建置与课程设置	341

二 学术期刊与史学发展·····	350
参考文献·····	365
后 记·····	373

绪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历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过去 90 多年了,但是它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常新的研究和思考的课题。90 多年来,人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迪,得到了自强与自立的信念,得到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勇气,也得到了在继承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向西方学习以建立新文化和新文明的初步认识。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发现,它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现代史学也由此而开始建立起来。

一 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强之路与史学近代化

鸦片战争失败后,封闭已久的中国不得不“开眼看世界”。西方列强展现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坚船利炮。18 世纪末乾隆皇帝对来华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所发“敕谕”中言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表现的“天朝大国”的自得心态,在近代以来与列强交战屡战屡败的结局面前,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势力所带来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挑战,中国的对应之举是仓促的和无奈的,百年来近代中国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途径,尝试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化的道路,是被动适应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现代化挑战的过程。鸦片战争前,面对西方列强在华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华侵略的意图和行动的日益明

显,已经出现了一些对外国史地的初步介绍性的书籍,但还十分零碎粗浅,也远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强烈震动了朝野上下,打破了长期以来“天朝大国”的优越心理。有识之士深感不能再无视天下之大、夷人之强、天朝的没落的现实,必须要“开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列强的情况,从中求得御敌之策和自强之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是经过严酷现实的打击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获得的。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林则徐、魏源等人。而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惨痛经历,即使是林则徐这样的人,也很难有开眼看世界的要求,如林则徐在禁烟时就说过,“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①,英国距离中国地域遥远,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本系恫喝,固不足信”^②。战争的失败,终于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籍,成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后,才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并在20年后的洋务运动中开始具体实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救亡图强的严酷现实中被动的、被迫地开始启动。受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落后的中国因自强图存而产生的第一个回应,就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在理论上的认识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开始认识西方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体西用论的实质,就是在保住中国旧的“体”的框架内学习并引进西方的器用。器用者,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以军事工业为主的机器生产技术,进而扩及造船、矿务、纺织等民用企业;而中国传统的伦理名教观念、专制体制政体等形而上

① 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第126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②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第762页。

的“道”的内容与框架是不能触动的。“西用”要有“中体”为前提，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和眼光只能局限于器物层次。19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沈寿康、孙家鼐等人都对中体西用论有所共识。洋务运动使当时的中国人真切地见识了工业化机器生产的成效与规模，而随着洋务企业的扩大，渐渐出现了一些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西方书籍的学馆，建立了一些专攻军事和工艺的学堂，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这些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不仅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更重要的是在对待西方先进文明的态度上，逐渐获得了在以往“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基础上的发展，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也渐次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一次促使中国人深刻反思自己的民族出路和现代化运动，因为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并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却被日本战败，签订了空前耻辱的《马关条约》，日本的强大成为不少中国人所关注的目标。问世于甲午战争前后的何如璋《使东述略》、黄遵宪《日本国志》、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等书，都对日本的发展作了记述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变法事例则对改良派、洋务派甚至一些顽固派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触动。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中体西用的观念及其内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为用”的西学不应局限于生产技术与科学工艺等器物层次，上层建筑的政治、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2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中华书局，1997年。

教育等体制如果不加改变,不仅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顺利进行,而且还会成为阻碍、桎梏现代化发展的因素。改良派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运动的进行,使中国的现代化从变革技术发展到了变革制度,从器物层次的学习上升到制度层次的改革。

维新运动的失败,终于使维新之士认识到了中体西用论已经不能成为救亡图强的济世良方,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洋务运动带来的办工厂、兴实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翻译西方著作等举措,已经为中国认识西方开辟了多种途径,维新思潮的兴起,辛亥革命的发生,更使西方的新思想开始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进化论的输入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并风行一时,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西方的现代竞争和自由意识等现代化思想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中体西用论的思潮则日渐衰落。

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寻求救亡图强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省,终于以不妥协的精神向旧传统和旧文明提出了挑战,不仅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而且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张以民主和科学为内涵的“欧化”、“西化”,全方位地涤荡封建旧文化,使中国真正走上自强的现代化之路。

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皆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抱残守缺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他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37、4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明确划分出了“学术”、“政治”、“伦理”三个阶段。梁启超更清晰地阐述了“近五十年进化”历程,第一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指出“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①。中国人认识到接受西方文明走现代化之路,是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再从制度层次上升到思想观念领域,是从充满着失败、屈辱、坎坷、曲折的近代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教训,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进步。百年来的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但总体趋势是一步步地走向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触及到了从思想观念上做彻底改造的核心问题,也真正意识到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途径的不断深入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戊戌维新思潮所导致的救亡图存、民族觉醒和争取民族独立意识的大大加强,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成为新的潮流。各地维新人士在全国设立了各种学会、创建了多种报刊和新式学堂。维新派突破了仅仅引入西方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范围,而涉及到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出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②梁启超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和《西政丛书集成》,指出西学是“致富之本,富强之由”^③。维新派的报刊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论著,有的还聘请了数种外文翻译,设立了译书局和译书分会。变法失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3—45页。

② 严复:《原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57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

③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448页。

败后,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更为充分,国内学界与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汇成了一股声势巨大的社会潮流,译书内容几乎涉及西学的所有范围,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翻译书籍出版,人人争购,市之为空……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涵沸,不可遏抑”^①。不仅从意识形态领域冲击了二千年来服务于专制制度的思想体系,而且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学术、文化、教育的起点。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趋向也日渐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落伍了,传统史学在其社会功能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和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值得肯定的是,近代史家们以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为传统史学的转型作出了贡献。魏源、张穆、何秋涛、徐继畲、夏燮、王韬、黄遵宪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等近代史学的内容,反映出了新的史学发展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②,学术思想界中,史学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维新派中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理论宣传家,多与史学有关系。他们借史学抨击旧制度和旧传统,宣传变法维新,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如下:

第一,指出传统史学的局限性,批判旧史学的种种弊端。戊戌思潮首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史学,这其实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唐才常认为传统史学“精史裁、订伪谬”者不乏其人,但

① 欧集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156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是能够“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之症结”者却“十无一二”^①。徐仁铸指出史学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无所发明,“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②。梁启超认为旧史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③。对旧史学的批判,在言词上虽不乏过激之处,但是面对步履沉重、老态垂垂的传统史学,多也切中要害。也正是在激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新史学。

第二,借鉴西方的史学思想,重视“民史”。梁启超最早提出“君史民史说”,他说历史应包括君史、国史、民史,历史应为“国民”而作。谭嗣同认为以往旧史忽略了对民间生活、教育、商业、工业和农业活动的记载,他进一步说明报纸就是民史。徐仁铸介绍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事。”^④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指出,旧史学多“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⑤。陈黻宸强调:“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⑥。宣传“民史”在史学中的重要性,在戊戌维新时期固然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权和民主思想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对于扭转史学观念有重要作用。人们从中认识到,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民史”在历史中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在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弊端,提倡“民史”的基础上,“史界革命”的口号被提了

① 唐才常:《史学论略》,《湘学报》第1册,1897年4月21日。

②④ 徐仁铸:《轺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3日。

③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7页。

⑤ 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

⑥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

出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①邓实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②1903年出版的《中国新史学》指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斲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史界革命”从政治上讲，意义在于清除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强化国民意识，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达到救国和图强的目的。从学术上讲，意义在于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史学观念，建立新史学。

第四，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是史学近代化乃至科学化的基本要求。随着戊戌维新时期对于史学的重视和“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人们也开始逐步涉及到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③把史学看成是唤醒国民意识、激发爱国热情、促进国家进步的手段。陈黻宸认为历史是“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如果“前有事而不知，后有故而不问，环球互市，风气大开，而懵然无所识者”，此为“学人之大耻”，因此，“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④，进一步强调了史学的重要性。夏曾佑认为：“智慧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史书撰述应当“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⑤。说明史学是社会必需的一门学问。上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虽然仅仅是初步的，但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①③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第1页。

② 邓实：《史学通论》。

④ 陈黻宸：《独史》。

⑤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